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# 唐 文 選

高文 何法周 主编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# 唐 文 选

上

高 文 何法周主编  
白本松 王宗堂 注释  
毕桂发 孙 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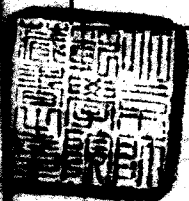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

21133786

1133786

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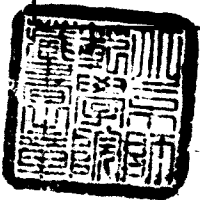
# 唐 文 选

下

高 文 何法周主编  
白本松 王宗堂 注释  
毕桂发 孙 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1133800

21133800

封面设计：古 干  
书名题字：高 文

**唐 文 选**（共二册）

Tang Wen Xuan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604,000 开 本 850×1168 毫 米  $\frac{1}{32}$  印 张 28  $\frac{1}{4}$  插 页 4

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 0,001—9,400

---

书 号 10019·4183

定 价 5.80 元

## 前 言

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无论是唐代的诗还是唐代的文，都是黄金时代。以作者作品而论，除因年代久远而自然流失者外，清人所编《全唐诗》九百卷，仍存作者两千二百余人，诗歌四万八千九百多首；《全唐文》一千卷，仍存作者三千四十二人，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；特别是出现了象李、杜这样的伟大诗人，象韩、柳这样的伟大散文家，可谓群星灿烂，震烁古今，极一时之盛！就风格流派而言，诗文至唐，文风大变，各体大备，风格多样，流派繁多，名篇时出，百花竞秀！并且，无论是唐诗还是唐文，皆上承八代，下启宋元，起了转旧为新、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，具有深远的影响，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宋初姚铉《唐文粹序》云：

“有唐三百年，用文治天下。陈子昂起于庸蜀，始振风雅；由是沈、宋嗣兴，李、杜杰出，六义四始，一变至道。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，雄辞逸气，耸动群听，苏许公维以宏丽，丕变习俗；而后萧、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，常、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，郁郁之文，于是乎在。惟韩吏部起卓群流，独高遂古，以二帝三王为根本，以六经四教为宗师，凭陵轹轹，首唱古文，遏横流于昏垫，辟正道于夷坦；于是柳子厚、李元宾、李翱、皇甫湜又从而和之，则我先圣孔子之道，炳然

悬诸日月。故论者以退之之文，可继杨、孟，斯得之矣！至于贾常侍至、李补阙翰、元容州结、独孤常州及、吕衡州温、梁补阙肃、权文公德舆、刘宾客禹锡、白尚书居易、元江夏稹，皆文之雄杰者欤！世谓贞元、元和之间，辞人咳唾，皆成珠玉，岂诬也哉！”

姚铉所讲，即唐代诗文发展变化之脉络、兴盛繁荣之盛况。所谓“贞元、元和之间，辞人咳唾，皆成珠玉”，主要是指我国中唐时期，由于文体的改革和解放，所造成的散文的极大发展及其昌盛局面。

讲到唐文，首先令人注目的，是中唐时期以韩、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。所谓古文，即秦汉以来所通行的散文。韩、柳的古文运动，就是借复古的口号来从事文学的革新。在文体方面，它要求用秦汉时期单笔的散文代替魏晋以来复笔的骈文。单笔、复笔，前人亦称之为奇、偶。文体奇、偶之分，盖始于西汉。刘师培在其《论文杂记》中即指出：

“西汉之时……若贾生作论，史迁报书，刘向、匡衡之献疏，虽记事记言，诏书简册，不欲操觚率尔，或加润饰之功，然大抵皆单行之语，不杂骈俪之词；或出语雄奇（如史迁、贾生之文是），或行文平实（如晁错、刘向之文是），咸能抑扬顿挫，以期语意之简明。东京以降，论辩诸作，往往以单行之语，运排偶之词，而奇偶相生，致文体迥殊于西汉。”

西汉、东汉奇、偶之分，可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为代表。司马迁的文章，全用奇；班固的文章，近于用偶。后来如蔡邕、范曄、潘岳、陆机以至于沈约、任昉，皆以班固为师，沿着《汉书》论赞的体系发展；茅坤所称的唐宋八大家则是以司马迁为师，沿着《史记》的体系发展。两系转相祖述，终于演成了骈、散的斗争。

这就是汉代以后我国骈、散斗争发展的大体轮廓。

东汉以后的建安时代，七子为文，皆以对偶易单行；内容上增加了抒情的成分，形式上增加了华藻的色彩，于是形成骈体文。自魏晋以至刘宋，潘岳、陆机、颜延之、谢庄之徒，又踵事增华，对偶逐渐严格，字句逐渐研练，辞采更加华丽，用事用典亦日趋繁密。南齐永明时期，王融、谢朓、沈约等人，大倡声律之说，又把平仄用之于诗文，于是变古赋为律赋，变古诗为律诗，骈文也成为四六。梁、陈及隋，皆沿此发展。

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，是一个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。文学的社会作用、作家的社会地位，开始被人们所认识；创作的内部规律、文章体裁的特点，开始为人们所探讨；文学作品的选集、文学批评的著述，开始成为专门的学问；史书中开始为文人立传、朝廷开设的学校中文学也开始成为独立的一科。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里，作家们为了创造文学园地中的新品种，而将长期积累、成熟有效的某些修辞手法与艺术形式集中起来，使之固定化、定型化，从而形成一种特定格律的骈俪文体，本来是顺理成章、势所必然之事，问题是不能把它绝对化；然而恰恰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里，人们把新形成的骈俪文体推向了绝对化的歧途。它以一格代各体，以一花掩百卉，骈文几乎是占领了所有文章的领域。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里，作家们为了探讨文章的艺术形式美，致力宫商，研精对偶，修饰词藻，讲究用典，以增强文章的表现力，这本来是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而非坏事，关键也是不能把它绝对化；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

代”里，人们又把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，推向了绝对化的歧途，“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”，致使文章，“殆同书钞”（《诗品序》），甚至“全借古语，用申今情”（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）；属对也愈来愈严，有言、事，反、正之目，而且还必比其句度，使语律齐同；而声律又有四声八病之拘忌。在这个时代里，许多人后来所追求的，主要已经不是更适宜于表现社会生活、抒发真实情感的新形式，而是为了掩饰其空虚腐朽生活内容的片面的形式美；因而它不仅不是有助于文学的发展，而是阻碍了文学的繁荣。

造成骈文衰敝的原因，主要有三：一是魏晋以来，人们在探讨文学艺术形式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片面性。如骈文讲求句式整齐、辞句对偶、润饰辞藻、运用典故、和协声律，都是在长期的实践、探索中逐渐发展成熟而被作为骈文的格律因素固定下来的。这时人们探索的重点，主要在文学的形式方面，后来愈演愈烈，因此很容易陷入片面性；二是社会政治的因素。魏晋以来，改朝换代频繁，政局异常动乱，社会政治黑暗恐怖，稍涉忌讳，辄遭屠戮，因此广大文士，除了谈玄饮酒，放浪形骸，寄情山水者外，只好在学问与才华上争高低，因此也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；三是六朝特别是梁陈时期，主宰文坛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腐朽堕落的门阀世族阶层，这是个极度寄生化的“纯食利阶层”。他们耽于逸乐，沉湎酒色，生活腐化，精神空虚，因而文学变成了反映他们荒淫生活的工具，填补他们精神空虚的手段。

反对骈文独霸文坛及其形式主义倾向的斗争，很早就开始了；但是，唐以前的斗争，都没有取得胜利。



譬如，《北史·苏绰传》载：“自有晋之季，文章竞为浮华，遂以成俗。周文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庙，群臣毕至，乃命绰为《大诰》，奏行之。”苏绰的其他文章，如“六条诏书”，全用单笔，实为文章复古始祖之一。但是，宇文泰、苏绰，在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，提倡《尚书》佶屈聱牙、质木无文的“谟诰体”散文，并且还用行政手段规定：“自是之后，文笔皆依此体。”所以西魏时期这次反骈斗争，终于失败了。正如《周书·庾信传论》所云：“绰建言务存质朴，遂糠粃魏晋，宪章虞夏，虽属词有师古之美，矫枉非适时之用，故莫能常行焉。”

再如，隋朝的李谔，“又以属文之家，体尚轻薄，递相师效，流宕忘反”，因此他上书隋文帝，请革除此弊。于是，“开皇四年，普诏天下，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。其年九月，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，付所司治罪。”（《隋书·李谔传》）隋文帝、李谔，仍以行政命令的手段，来推行文章的改革，结果也失败了。

唐朝建国以后，反对骈文独霸文坛及其形式主义倾向斗争的形势，逐渐起了变化。

这首先是因为隋末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，摧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阶层的主要势力，改变了他们垄断社会政治文化的旧局面；唐代实行的均田制与科举制又将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，源源不断地送上了社会政治文化的舞台，从而使封建统治阶层内部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组织上的更新。唐代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，又促使地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重视文化教育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教育的发展普及，因而朝野之间又不断地造就着一批批新的文人学士。唐初经过贞观之治，社会生产不断上升，国家空前强大统一，对儒释道兼容

并收，中外文化交流频繁，这对于广大士人开阔眼界、活跃思想与增强自信心、自豪感，起了巨大的作用。他们在生活上比较接近社会实际，政治上又积极要求进取；其中不少人“遍观百家”，好谈“王霸大略”，有志于“济苍生，安社稷”，如韩愈辟佛老，俨然以天下为己任，柳宗元在肯定君权的前提下，倡言“公天下”，政治思想，精神面貌，文化教养，皆与过去的门阀世族阶层有很大的不同，并对文学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。所以随着唐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，为了适应安史乱后中唐社会的需要，要求创作便于表达思想、比较接近语言、舒卷自如的散文的呼声，便愈来愈加强烈，终于出现了古文运动的高潮。

其次，唐代的反骈斗争，是在认真总结过去骈、散文写作的经验教训，研讨文章的写作规律，吸取已往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。他们对于文学的地位、作家的修养、体裁的特点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以及写作技巧、语言修辞、艺术风格等一系列的问题，都重新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与讨论，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学习与实践，从而清理了旧的积习与偏向，开创了推陈出新的局面。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云：“韩文起八代之衰，实集八代之成。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，以无所不包，故能无所不扫也。”唐朝以韩愈、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为高潮的文章革新运动，虽然标榜以文章复古为目的，但却将我国古典散文推向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。

唐代文学复古的口号，首倡于武后时期的陈子昂。他的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，虽然主要是针对诗歌革新而发，但在骈文仍然统治唐代文坛的时候，大张复古的旗帜，且序文的

写作亦用散体，确实起了开始转变文章写作风气的重要作用。同时他以《谏灵驾入京书》为代表的一些论事疏奏，也采用畅达的散体，尽管其中还带有较多的骈偶句式，但大体上能恢复古典散文的格局，在当时表现了很大的革命性。唐文起八代之衰，断推子昂为第一。后来的古文家如萧颖士、梁肃、韩愈、柳宗元等，对他所起的作用，都有较高的评价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亦云：“唐兴，文章承徐、庾余风，天下祖尚，子昂始变雅正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也说：“子昂诗文，在唐初实首起八代之衰者。”此后，开元时期的大手笔、骈文大家张说，写有少量散文，具有崇雅黜浮的功绩；王维、李白等，主要成就在诗歌方面，然也有少数散文名篇传世。

从天宝时期到贞元以前，文章复古亦即革新的理论，逐渐提出并粗具轮廓，且涌现出一批有名的古文家。

天宝时期，萧、李齐名。萧颖士为文，主张以六经为准则，强调“雅颂遗风”，“王化根源”。李华《唐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》云：

“君（萧颖士）谓六经之后有屈原，文甚雄壮，而不能经；厥后有贾谊，文词详正，近于理体；枚乘、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，然而不近风雅；扬雄用意颇深，班彪识理，张衡宏旷，曹植丰赡，王粲超逸，嵇康标举；此外皆金相玉质，所尚或殊，不能备举。左思诗赋，有雅颂遗风；干宝著论，近乎王化根源；此外皆复绝无闻。近日陈拾遗，文体最正。以此而言，见君述作。”

独孤及《赵郡李华中集序》则记载了李华对忽视内容，追求声律对偶的“时文”亦即骈文的批评：

“自典谟缺，雅颂寝，王道陵夷，文教下衰，故作者往往先文字，

后比兴；其风流荡而不返，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，则润色愈工，其实愈丧。及其大坏也，伧偶章句，使枝对叶比，以八病四声为楷范，守之如奉法令。”

他还认为，这类文章“文不足言，言不足志，亦犹木兰为舟，翠羽为楫，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”；因此提出，“用三代文章，律度当世”。理论如此，在写作实践上，亦正如独孤及所说：

“公(李华)之作本乎王道，大抵以五经为泉源。抒情性以托讽，然后有歌咏；美教化、献箴谏，然后有赋颂；悬权衡以辨天下、公是非，然后有论议；至若记叙编录、铭鼎刻石之作，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，非夫子之旨不书。故风雅之指归，刑政之根本，忠孝之大伦，皆见于词，然后中古之风，复形于今。”

李华关于道为文本、文切实用与务反“时文”的理论主张，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，并对韩、柳有较大的影响，所以被誉为“文章中兴”的开启者。

与萧、李同时并起的贾至，是贾曾之子；父子同知制诰，玄宗称其“父子继美”，亦主张文“含六经之奥义”，与李华经为文源说略同；而苏源明的散文名篇《秋夜小洞庭离宴序》，不仅在意境方面，对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有所影响；而且用词铸句，戛戛独造，表现了“词必己出”的特点，对韩愈有所启迪。

李华爱奖士类，若独孤及、韩云卿(韩愈叔父)、韩会(韩愈之兄)、柳识、崔祐甫、皇甫冉等，皆因李华的奖掖而得名。萧颖士之子存，亦能文辞，与韩会、梁肃、沈既济等友善；韩愈少时，亦为萧存所知。至于梁肃，又是独孤及的门生；韩愈中进士，是由于梁肃的推荐；散文家李翰，是李华的宗子，李观是李华

的从子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唐文章发展的渊源继承关系以及萧、李在文章复古中的重要地位。

大历时期，元结是最有风格的散文家。《新唐书·文艺传·苏源明传》说苏源明最称者元结、梁肃。《郡斋读书志》讲“其辞义幽约，譬古钟磬，不谐于俚耳而可寻玩”；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讲“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，自结始”。他的《大唐中兴颂》，峻伟雄刚，词与事称；他的《右溪记》，幽眇芳洁，开柳宗元山水记之先声。总之，他的散文，真挚剀切，不事华藻，风格质朴，用笔峻削；但也不时出现语言枯瘠，形象不大鲜明的缺点。这是韩、柳之前，古文运动先驱者不少人的作品中，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通病，也是唐代散文还未发展成熟的表现。

独孤及、梁肃，在唐文复古运动中也起有重要作用，且对韩愈等有直接的影响。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云：“大历、贞元之间，文字多尚古学，效扬雄、董仲舒之述作，而独孤及、梁肃，最称渊奥，儒林推重。愈从其徒游，锐意钻仰，欲自振于一代。”崔祐甫《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》讲到独孤及的文章时说：“当代词人，无不畏服。”梁肃在《毗陵集后序》中指出独孤及的文学主张，是“先道德而后文学”，以取法两汉为标准。梁肃在理论上受独孤及的影响，也主张“文本于道”，并进一步提出了“气能兼词”的论点。他在《李翰前集序》中说：

“故文本于道，失道则博之以气，不足则饰之以辞。盖道能兼气，气能兼辞，辞不当则文斯败矣。”

梁肃的理论，后来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中作了进一步发挥。

从上述情况看，道为文本、经为文源与取法三代两汉的思

想以及“气能兼辞”、“词必已出”等主张，从天宝、大历以来，已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们提得越来越明显，并以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为贞元、元和时期古文运动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。只是由于他们在创作上偏重于实用而艺术性不足，还没有创作出足以胜过骈文的大量散文名篇，还没有出现足以占压倒优势的古文作者群等原因，因而还不能算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成熟阶段罢了。

到了贞元、元和时期，韩愈、柳宗元崛起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。他们在理论上不仅更加系统完备，而在创作实践上使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的地步。他们不仅写出了大量雄奇奔放、俊杰廉悍的政论、文论、史论等散文名篇，而且还创作不少形象鲜明、感情真挚的传记、杂记、寓言、游记与抒情散文的佳作，以其深厚雄伟的功力，锤炼精粹的语言、独特多样的风格，显示了散文在艺术上的巨大表现力与优越性。

韩、柳的古文创作，以贯道、明道为宗旨，以忧国忧民为归宿，或针贬时政，考论得失，献纳箴谏，以力挽中唐颓势；或揭露贪官，鞭打奸吏，倡导仁政，以解生民于倒悬，不仅在思想内容为六朝以来的骈文所无法比拟，而且在艺术上亦有卓越的造诣，独特的风貌。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古典散文的优良传统，而且还创造性吸取了骈文讲究对偶排比、声韵节奏的长处，使文章散骈相间、随势而异，声调优美，节奏铿锵，句式整饬匀美而又错综多变，贯注一种雄浑疏宕之气；而且都注意吸收前人与当代的语言，以熔铸新词。他们虽然反对骈文的词藻华丽，但他们的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多彩；他们虽然反对骈文的堆砌典故，但他们的文章更有事理的根据；他们虽然反对骈

文的形式主义倾向，但却创造了比骈文更宜于表现内容的完美形式。同时，他们还以文会友，奖拔后进，在其理论号召与创作实践的影响之下，正如姚铉在《唐文粹序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，贞元、元和前后，一时古文作家蜂起，形成了一个“辞人咳唾，皆成珠玉”的古文创作高潮，从而动摇了骈文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地位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与韩、柳同时的散文家，如刘禹锡才辩纵横，吕温雄辞杰出，吴武陵气势凌厉，皆近于柳；樊宗师、李观、欧阳詹、皇甫湜、李翱、李汉、张籍等，或是韩愈朋友，或为受业弟子；有的趋向艰涩，有的宗尚平易，有的追求奇崛，成就一般虽然不大，然亦各自有其风格；白居易、元稹的散文，平易畅达，在当时自树一帜。

晚唐杜牧雄奇超迈，舒元與文辞赡逸，与孙樵等人，实为韩氏后继。孙樵的散文，通畅晓达，然其文学主张，片面发挥了韩愈、皇甫湜的奇险说，刘蛻则更加险怪，从而将古文引上了狭小琐细的道路。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等人，虽然能坚持韩、柳的传统，写作了出色的讽刺小品，被鲁迅先生誉为“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，但已寡不敌众，于是骈文在文坛上又恢复了统治的地位。

北宋初年，柳开、王禹偁、姚铉、穆修等人，标榜韩、柳古文，势力不及西昆；到了北宋中叶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欧阳修等再次掀起新的古文运动高潮，由于欧、曾、王、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与成功，韩、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，支配中国文坛近千年。

唐代的文章革新，虽以韩、柳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为高潮，

然其历史的功绩，绝不仅仅在散文方面，它对骈文亦有新的改造与发展。纵观有唐三百年，许多作家骈散兼工，并涌现出不少骈文名家，创作出了许多传世名作。我们对于这方面的成就，也应给予应有的评价。

唐初文体，一般沿袭梁、陈余习，但如魏徵的奏疏，却用笔简劲，扫去浮华。所以亦有人将其《谏太宗十思疏》（即《论时政第二疏》）、《十渐不克终疏》等列入散文类中，并认为“公之文虽用偶句，而词旨割切，气势雄骏，与六朝骈文俚黄妃白者迥然殊途，陆宣公献纳之文即出于此，后来欧、苏奏议皆用其体，应用之文，以此为宜”（高步瀛《唐宋文举要》上册，魏玄成《十渐不克终疏》评语）。魏徵此类文章，可以说是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“宜以古之制裁为本，今之辞调为末，并须两存，不可偏废”与“务去泰去甚”等主张的实践。在唐初，象魏徵、李世民的文章，一开始便以内容恳切充实见称，摆脱了六朝时期的形式主义倾向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四杰是初唐时期的主要作家，他们的宏篇巨制，闳博瑰丽，震铄一时；较之徐陵、庾信的文章，亦有所改变。前人已经指出：“四六盛于六朝，庾、徐推为首出，其时法律尚疏”；唐兴以来，如四杰、燕许，“体备法严”（程杲《识孙梅四六丛话》）。所谓唐兴以来，体备法严，是指到了唐代以后，就象近体诗的格律愈来愈严密一样，骈体文的格律也愈来愈严格：对偶更加精细、平仄要求严密、用典讲究精切。这是其发展的一个方面；骈文到四杰时代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：语言趋于通俗、用典比较自然、内容有所开拓，意境比较清新。这在骈文发展史上是又一个可贵的进步。至如落霞孤鹜之景，一抔六尺之情，英思



壮彩，珍词绣句，千载以来，脍炙人口。我们不能因为它是骈体，而不承认它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成就。

此外，有朱敬则、崔融、宋之问、李峤等，亦皆一时之选。首倡文学复古的陈子昂，文集中主要也是骈文；其中有些篇章，沉郁顿挫，慷慨悲壮，思想情调，与齐梁迥然有别。

张说是开元时期的骈文大家，亦工散文。他的骈文，本以气势胜，然亦有兼徐、庾之长的秀丽佳作。而他的《贞节君碣》、《卢思道碑》，雅洁渊懿，尚有蔡邕遗则，亦被收入散文；他的《宋公遗爱碑颂》，写得真挚生动，别有风格，龚自珍《唐文目》于张说文独取宋碑，良有见地。张嘉贞的《石桥铭并序》，简奥精切，骈俪之文，间以散句，自成一格。另外，如张九龄、李邕、王维、李白等等，也是骈、散兼工，几乎是都有骈、散名篇传世。

中唐前期，杨炎、常袞，同知制造，蜚声一时。杨的撰述，高者上追魏晋；常作亦可方驾颜谢。《新唐书·文艺传序》称，“制册则常袞、杨炎、陆贽、权德舆、王仲舒、李德裕”，“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”。其中最突出的是陆贽的骈文。

陆贽的奏疏，是唐代骈文的最高典范，并为后世所取法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《新唐书》例不录排偶之作，独取贽文十余篇；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尤重贽议论，采奏疏三十九篇；其后，苏轼亦乞以贽文校正进读。盖其文虽多出一时匡救规切之语，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，无不深切著明，有足为万世龟鉴者，故历代宝重焉。”曾国藩《鸣原堂论文》亦云：“骈体文久为大雅所羞称，以其不能发挥精义，并恐以芜累伤其气也。陆公则无一句不对，无一字不谐平仄，无一联不调马蹄，而义理之精，足以比隆濂、洛；气势之盛，亦堪方驾韩、苏。退